

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研究^{*}

康健

内容提要:清同治年间西商前往新疆贸易中断,商民生计难以维系。为了维护边境商业秩序和增加财政收入,清廷同意西商假道恰克图出洋贸易,在税厘、归票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严格规定西商假道恰克图的贸易路线、贩运茶叶名色等,以避免西商与北商的经济利益冲突。然而在商业贸易过程中,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致使西商不堪重负,假道出境贸易的热情不断衰退,亦出现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等逃厘漏税现象。

关键词:晚清 西商 假道 恰克图 贸易

一、引言

在清代的贸易网络中,位于北部边境的恰克图一直是清政府重点关注的地区。恰克图贸易与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五口通商后,恰克图贸易虽仍在继续,但已出现不断衰落的迹象。^①咸同时期,西北边境对俄贸易的一度中断,扰乱了边境社会经济秩序与商民生计,也影响了清政府的税收。为了安定边境商贸秩序和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于同治七年(1868)同意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赴俄贸易。关于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赴俄贸易,米镇波认为这是清政府对外事务的一个创举,虽然因成本高、经营品种有限及语言障碍等问题,西商贸易热情不高,但其重要性并不因人数多少而受损;^②赖惠敏则指出必须找更多的资料,专门撰文研究;^③山西地方文史工作者在探讨山西外贸史发展过程中,也对此有所涉及。^④这些研究成果因研究重点的不同,未能对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展开深入探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主要利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中的《华商请由恰假道通商案》(4册)、《调查华商由恰赴俄贸易情形案》(1册)、《华商由恰假道通商逃厘漏税案》(1册),结合《筹办夷务始末》《晋商史料全览》《山西献征》等文献,对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的缘起、商人与商号以及西商在贸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谓“西商”,与一般文献记载的西商有所不同。一般文献资料记载的西商,以地域单元区分,是对山西商人、陕西商人或山陕商人的代称。官方档案记载的西商,则主要根据贸易路线来划分,如总理衙门档案记载:“张家口商人谓之北商,归化城商人谓之西商,西商领票

[作者简介] 康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芜湖,241000,邮箱: jiankang1220@163.com。

* 本文为2017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京津冀文化史研究”(批准号: ZD201723)阶段性成果之一。向匿名审稿专家致谢。

① 参见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151页。

②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22页;米镇波:《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7页。

③ 赖惠敏:《十九世纪晋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陈熙远主编:《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第615—616、631页。

④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外贸志》,1984年印行,第68—69、78—81页。

在归化城,北商领票在张家口。”^①显而易见,西商是从归化城出发,向西前往新疆地区贸易;北商则是从张家口出发,向北经库伦地区,前往恰克图贸易。^②二者的贸易路线不同,在商业经营中领票之关口也有差异。

二、西商假道恰克图通商之缘起

同治年间,通往新疆贸易的商路受阻,西商因此提出了假道恰克图贸易的诉求。

(一) 通往新疆贸易商路受阻

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陕甘回乱”,^③影响波及陕西、甘肃、新疆地区,对西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当时的清廷官员文祥奏称:“新疆自回匪倡乱以来,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以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木垒河一带,乱者四应,日益蔓延,几有不可收拾之势。”^④与此同时,沙俄于同治三年十月强迫乌里雅苏台将军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同治十一年,沙俄派兵侵占伊犁,开始对其长达十年的统治。此外,中亚浩罕国阿古柏亦乘机进犯新疆。^⑤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开始西征。光绪四年初,清廷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此后,经过艰苦的外交谈判,清廷收复伊犁,并于光绪十年设立新疆行省,当地逐步进入安定状态。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年之间,新疆的广大地区处于战乱状态,大量人员伤亡,众多房屋被毁,民众陷入困苦之中。以较为繁华的乌鲁木齐为例,战前“景象繁华,西人曾有小南京之目”,^⑥战后却是满目疮痍,“户口上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⑦

在这种形势下,西商通往新疆的贸易路线受阻,商品滞销,商民生计难以维系。绥远城将军裕瑞、归化城副都统桂成奏称:“自同治三年六月间,乌鲁木齐一带突被回匪蹂躏,商民四散奔逃,无所归依,迄今三年有余,尚未平靖。商民沿途返回之货并办就之货,无处脱售,是夷商应用之货既不能用,而商民应销之货亦不能销,以致两受其困,均难生理。”在乌鲁木齐的西商余鹏云目睹了当时之情形:“道路梗阻,西边一带商民,如鱼绝水,无以为生。”^⑧

(二) 呈请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

因无法通往新疆对俄贸易,西商余鹏云“从塔尔巴哈台口,与俄商相伴出境,从俄罗斯地面绕路,由恰克图口而回。目睹各国俄商各情形,上下赖贸易为生,日盼通商”。^⑨通过考察,他了解到俄商也迫切期盼通商,便于回国后,在西商领袖程化鹏的带领下,与孔广仁等商人联合向理藩院提出假道恰克图经商的申请。

绥远城将军裕瑞认为:“归化城为商民辐辏之区,向来贸易者,均系往喀勒喀四部落及新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一带行商。自同治三年新疆各城沦陷,不惟本地商民大半歇业,而新疆逃归者日如归市,均无生理,坐受其困,以致游手者日多一日,民既不能聊生,更恐穷迫而为匪。当此经费支绌、

① 《呈报遵查华商领照赴俄国地方贸易现在情形由》(同治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4-02-003。本文所用总理衙门档案，均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参见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9—147 页。

③ 参见潘登《清同治“陕甘回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藏民族大学，2016 年。

④ 《清穆宗实录》卷 113，同治三年八月壬午，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05 页。

⑤ 参见阿地力·艾尼《清末边疆建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6—79 页。

⑥ 萧雄：《西疆杂述诗》卷 2，张志主编：《中国风土志丛刊》第 25 册，广陵书社 2003 年版，第 114 页。

⑦ 《新疆图志》卷 96《奏议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5 页。

⑧ 《裕瑞桂成奏归化城商民程化鹏等因回乱失业拟请由恰克图俄边与西洋通商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1，第 2161—2162 页。

⑨ 《裕瑞桂成奏归化城商民程化鹏等因回乱失业拟请由恰克图俄边与西洋通商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1，第 2162 页。

兵民交困之际,边方多事之秋,自当设法筹济疏通,以苏其困。”在收到西商程化鹏、余鹏云等提出假道恰克图贸易的申请后,裕瑞出于安定边境商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奏称:“余鹏云与俄商伴归,伊指明由俄边通商,西洋各国无不乐从。是以叩恳俯念商、夷生路攸关,代为奏明,由恰克图口假俄国之边通商。如蒙恩准,不惟商民等现存之货得以脱售,即西洋各国应用货物亦不致缺乏。当此国家需饷之际,商民等亦情愿按所发之货,除向例纳税外,捐输厘金,备充公用。”^①为确保假道恰克图贸易有序进行,裕瑞还对贩运商品、纳税税则、厘金等方面作出明确说明,希望先“试办一年,查看行商如在五十起以上,再行派员赴部领票”。^②该奏折拉开了西商假道恰克图经商的帷幕。因事关重大,同治皇帝收到奏折后,第二天就批复总理衙门,要求就此事进行商议。

收到同治帝的朱批后,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訢于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呈奏折,就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顾虑及具体问题进行了阐述:

该将军据该商所呈,请将向由西路贩运之货,改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销,自系变通办理之一策。但商情虽不可不恤,而边衅尤不可不弭。伏查俄国创办陆路通商,只有恰克图一口,准其贩货由于库伦、张家口径达天津,出入往来,定有税则;至塔尔巴哈台等处,向设商圈,本只每月交易一次,不准任意往来。原因俄境与内地毗连,防范宜严,不容稍涉玩视。乃近年来俄国东则欲于吉林、黑龙江等处通商,北则欲于张家口改设口岸,畅行贸易。数年来要求甚急,均臣衙门极力驳阻,正所以弭边衅也。兹该将军以假道通商,如恐小民无知,生事构衅,该商民等情愿查明商贩来历,货物可行者方令前往,情甘作保,断不敢冒昧滥行,似于杜渐防微,未始不力求把握。惟臣等详加体察,此中情弊,固在于边外之易启别衅,尤在于边内之任意行走,为患滋多。归化城与张家口相距不及千里,设令俄人以蒙古地无税之货,借端与华商在归化一带,暗地私相交易,是不得于张家口,而得于归化城,其弊相因,其害相等。^③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奕訢对于边患问题比较敏感,这主要是针对沙俄不断蚕食中国西北边境而提出来的,因此他的原则是“商情虽不可不恤,而边衅尤不可不弭”,体恤商情的前提是消除边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通过全盘考虑后,奕訢提出:“西路商已困极,不能不为别开生路,酌量变通。姑准将西路之茶,改由北路出恰克图一带销售,仍俟西疆收复,改照旧章。但必须将茶货领票出口,不准中途零售,及归化城附近私自与俄人交易,如有违犯,商民治罪,货物入官。”^④虽然同意西商假道俄边贸易,但其仅是权宜之计,待新疆平定后,西商必须按照“旧章”,到西疆贩茶贸易,^⑤不得再假道恰克图贸易。同治帝朱批“依议”,同意了奕訢的奏请。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分别向绥远城将军、理藩院和户部发文,要求各衙门妥议覆奏。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绥远城将军裕瑞、归化城副都统桂成奏称:“归化城商民向往西疆贩运

① 《裕瑞桂成奏归化城商民程化鹏等因回乱失业拟请由恰克图俄边与西洋通商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第2162页。该奏折又收录于总理衙门档案,《具奏归化城商民呈恳由恰克图假道与西洋通商情愿照例纳税加输厘金奉旨议奏由》,档号01-20-026-01-001。

② “查该商民等向往贸易茶斤,均系驼载,除照例应纳税课令照旧章交纳外,拟以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按归绥道税则,每百斤纳税银一钱八分核计,酌增定章,每驮现拟抽收厘捐银六钱,该商民等均亦情愿乐输。惟向往新疆贸易者,均系由理藩院领票发给,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驮为率。”《裕瑞桂成奏归化城商民程化鹏等因回乱失业拟请由恰克图俄边与西洋通商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第2161—2163页。

③ 《奕訢等奏议覆归化城商民假道俄边与西洋通商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第2228—2229页。

④ 《奕訢等奏议覆归化城商民假道俄边与西洋通商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第2229页。

⑤ 参见米华建著,贾建飞译《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资和清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1、216—219页;蔡家艺《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334页;蔡家艺《清代新疆茶务探微》,《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茶斤,均系殷实守分之民,如果准令改道通商,似于国课可裕,民生可便。倘日久壅滞不通,俄人前已来归化,若有无知奸民勾串,私相交易,必与国课、民生两无裨益”,^①二人均认同西商假道恰克图通商可以收到“国课可裕,民生可便”之效。

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总理衙门要求会同户部、理藩院等一起派员到恰克图进行实地勘察,会商归化城商民假道俄边经商之事。^②正月二十日,奕訢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先后进呈三件奏折,并在第一件奏折中称:“臣等公同商酌,拟由总理衙门、户部、理藩院,各自遴委员一人,会同前往恰克图,勘查明确,再为定立章程,似于边务、商情两有裨益。”^③要求总理衙门会同户部、理藩院派员前往恰克图实地勘察,以做到对边务商情有总体把握,这项建议亦获得批准。

与此同时,由于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侵蚀中国商业市场,尤其是《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可以自行“由天津贩运土货,赴恰克图贸易,华商利为所夺,大半歇业”;^④加之,清政府对华商强加盘剥,苛捐杂税繁重,致使西商、北商均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因此,为鼓励华商贸易,遏制俄商势力过分膨胀,奕訢在同治七年正月二十日进呈的第二件奏折中指出:“臣等再四密商,惟有将恰克图商务设法经理,鼓励西、北两路商民同往贸易,以分俄商之利。将来恰克图百货云集,日见兴盛,则张家口通商之议,或可不即来争,似亦釜底抽薪之一策。”^⑤同治皇帝朱批“依议”。如此一来,西商假道恰克图通商的呈请得到了清廷的正式认可。

(三)清廷派员实地勘察商情

由于西商假道恰克图与西洋诸国贸易涉及国际问题,因此奕訢在同治七年正月二十日进呈的第三件奏折提出:“至于外国一切事件,恐非该委员等采访所能尽悉,现拟密飭总税务司赫德,于税务司内酌派一人,以游历为名,赴恰克图一带密行查探俄人及西洋各国与华商贸易利弊,以备查核。”^⑥即对于西商假道恰克图通商的具体细节问题,总理衙门、理藩院、户部等各衙门之间进行协调,各派一员会同前往恰克图勘查商情。

同治七年二月初一日,在理藩院、户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决定分别派知府衔员外郎华福、四品顶戴员外郎李常华前往恰克图勘查。二月初十日,奕訢奏称,“查看臣衙门章京行走、候选知府、礼部员外郎恩纶,办理俄国事务当属熟悉,拟即飭令该员会同李常华等前往。”^⑦该提议得到批准。总理衙门第二日即将此意见传达给户部和理藩院。总税务司赫德亦派出税务司马福臣,于二月二十七日从北京起程,前往恰克图,与上述三部门人员一起勘查商情。^⑧三月三日,理藩院、户部、总理衙门所派华福、李常华和恩纶从北京出发,前往恰克图勘查商情。^⑨四月初八日,三人到达恰克图,并于五月十七日由库伦返回北京。在考察商情期间,他们将各地实际情况报告给总理衙门,详细阐述西商、北商在贩运茶斤、贸易路线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张家口、恰克图等地的商贸情形有所陈述。六月初六

① 《裕瑞桂成奏查覆归化城商民程化鹏等借到贩茶情形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6,第2289页。

② 《片送会奏归化城商人假道俄边通商奏稿由》(同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3。

③ 《遵议归化商民由俄边借道应先派员勘查明确事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④ 《密陈税务归恰经理免致俄人争执张家口通商由》(同治七年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7。

⑤ 《奕訢等又奏西北商贩茶情形拟将恰克图商务设法经理片》,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第2309页。

⑥ 《密飭赫德派税务司赴恰查探俄人及各国与华商贸易情形由》(同治七年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8。

⑦ 《派员前往恰克图查勘情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第5册,第339—340页。

⑧ 《札借给税务司马福臣银两由》(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0。

⑨ 《请由恰假道通商一节本处无从悬揣现已派委查勘情形由》(同治七年三月三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3。

日,李常华禀称:“至归化城商人贩茶,系贩千两、珠兰等茶,即路过恰地,各行各货,与(笔者注:北)商等生意并无妨碍。”^①由此可知,西商贩运珠兰、千两茶,北商贩运白毫、武夷等茶,两者在恰克图贸易中没有冲突。此外,西商将茶叶运输到恰克图后,尚须进入俄国境内,将茶叶专卖给新疆等地的俄商,再由俄商将茶叶转售给西洋诸国;北商则是将茶叶运输到恰克图后,与俄商直接在买卖城交易。^②

由于无论西商还是北商皆在恰克图集散商货,因此当地的商业情形直接关乎华商的整体利益,也影响着边境社会秩序,及时了解恰克图的商业情况对清廷十分关键。总体而言,在《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之前,俄商不能自行入内地买茶,华商贸易兴盛,获利很多。但其后,俄商自行进入内地购茶,华商利益为其所夺,北商贸易日渐衰败。加之,清政府对北商课以重税,致使其纷纷歇业。自同治元年后,“买卖城大号约有二十一二家,俱已关闭歇业,现在只存大号十三家”。^③因在恰克图无利可图,北商铤而走险,绕道归化城,并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对此,张家口监督成孚于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称:“惟闻张家口商人近多绕行西路贩货赴归化城,意欲出口北上。经前将军裕,以该商应由张城出口,现若绕行西路,有碍张城税务,阻令折回旧路,该商能否遵行,尚未探悉,足见西商假道通商有利可图,以致向由张城赴恰者,现在跟迹贩运,绕赴归化城贸易,若均影射前往,不但于张家口税务有碍,且恐归化城一带有与俄人私相交易。”^④可见,北商出境贸易扰乱了既有商业秩序,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确是十分有利可图。

经过派员实地考察,总理衙门基本掌握了归化城、库伦、恰克图等地的商业情形。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奕訢奏请准许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先行试办一年,并对西商假道恰克图赴西洋通商章程(主要包括贩运茶斤品种、税厘、部票、执照、票规银等内容)作出相关规定,以规范市场秩序。具体内容如下:(1)在贩运茶叶品种方面,西商只准贩运珠兰、^⑤千两等茶,不准贩运北商经营的白毫、武夷等茶,以避免西商与北商的经济利益冲突。“西商所贩千两、珠兰等茶,卖给西洋诸国,系指缠头、回子地方而言,缘千两、珠兰等茶,俄人与蒙古向皆不用,惟缠头、回子地方始购此茶,与北商所贩安化白毫等茶,向卖给蒙古及俄人者不同。西商贩茶至恰克图地方,于北商生计毫无妨碍。”(2)在税厘方面,北商每张部票厘金费为60两,考虑到西商因“贩货至恰后,尚须假道俄边,前赴西洋诸国通商,道途鸾远,川资较多,自应比照察哈尔抽厘章程,酌减抽收,以示体恤”,每张部票只需缴纳30两。^⑥(3)在部票方面,同治七年十月至八年十月,一年内先行请领,约需部票100张,若年内尚未用完,则需于年底缴到部核销,等到次年十月再行报部请领,^⑦且每票不得超过12000斤。(4)在执照方面,改三联执照为四联执照,并对执照内容填写做出明确规定。“所有归化城商人,欲赴恰克图假道俄国,往西洋诸国贸易,请领部票时,仍由绥远城将军预行照例报院,理藩院仿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联执照办法,一体发给四联执照,由该将军衙门于四联执照内,填写商民姓名、茶叶名目、斤数,并于应截之联,骑缝中间,注明某字第几号,铃盖印信,发交该商”。^⑧(5)在票归银方面,北商在张家口税关每张部票需交纳库平足色银50两,而西商只需缴纳25两。在恰克图司员办公经费方面,北商每

① 《禀报赴恰查看茶商各情并借支库伦买卖章京应解银两数目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9。

② 《禀报到口日期并查明收厘各情由》(同治七年四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6。

③ 《详述买卖城商情由》(同治七年六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41。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也显示,同治前期北商在恰克图贸易日趋衰落。1855年以前大约在50家以内,1858年83家,1862年98家,1863年37家,1866年以后维持在10余家。

④ 《详述税务减少并厘卡抽税情形以及假道通商各情由》(同治七年三月三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2。

⑤ 关于珠兰茶,参见阿·科尔萨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⑥ 《会奏归化城商人呈恳假道通商拟请先行试办由》(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53。

⑦ 《咨报派员赴部请领四联部票一百张相应知照由》(同治七年九月十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57。

⑧ 《会奏归化城商人呈恳假道通商拟请先行试办由》(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53。

张部票扣银 3 两,西商只需扣 1.5 两。^① 这些惠商政策显示出晚清政府面对沙俄的经济渗透,^②为振兴商业、挽回商业利权、保证税收而做出的进步举措,而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即在此背景下逐步展开。

三、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中的商人与商号

在获得清政府批准后,西商于同治七年十月开始请领部票,开启假道恰克图赴西洋贸易的历程。下面将对其中的商人、商号及其相关情况进行具体论述。

同治七年九月,理藩院发给四联执照、100 张部票,由绥远城将军转发给西商承领,用不完的年底缴部核销。虽属于初创,但因清政府实行惠商政策,西商当年积极踊跃领票,假道恰克图赴俄边经商。对于同治七年西商领部票的情况,绥远城将军定安称:“十月初八、二十四、十二月十八等日,先后据商民余鹏云等,并据商民程化鹏结保,商民杜明桂、张抡元等,三次共请领部票二十七张,业经本处将天字第一号起,至第二十七号,四联照票二十七张,填写商人姓名、茶叶名色、斤重数目,钤盖印信,遵照奏定章程,抽收厘金后,截下第一联,饬交各该商民等承领前往,曾将发过照票数目,以及商人姓名造册,并将所截第一联执照,均已按起,随时咨送理藩院。暨造册,咨送总理衙门查照各在案。”^③短短 3 个月内,请领部票就多达 27 张,西商最初假道恰克图赴俄贸易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西商所领的商业部票必须详细记载商人姓名、茶叶名色、数目斤两等信息,如同治七年底,余鹏云、张抡元所领部票即载:

一、商民余鹏云请领部票二张,于本年十二月十八日起程,由恰克图假道俄境,前赴西洋诸国贸易,限旋回日呈缴。

商人余鹏云,年四十五岁,系定襄县人。

天字第二十五号照票一张,珠兰茶一百包,重一万二千斤。

天字第二十六号照票一张,篓子千两茶一百包,重一万二千斤。

一、商民张抡元请领部票一张,于本年十二月十八日起程,由恰克图假道俄境前,赴西洋诸国贸易限,旋回呈缴。

商人张抡元,年三十七岁,系忻州人。

天字第二十七号照票一张,珠兰茶十二包,重一千四百四十斤,篓子千两茶八十八包,重一万五百六十斤。^④

由此可见,出境贸易商人承领的部票,除了记载商人贩运茶叶名色、斤两外,还记载商人的乡贯、年龄等,这些信息均有利于商业管理。

在西商假道恰克图赴西洋贸易进行半年之后,总理衙门于同治八年四月初二日分别给绥远城将军、伊犁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山西巡抚、察哈尔都统等发文,称:“查阅叠次来册,该商等请领执照已有二三十号之多,想该商等假道俄边,前赴西洋各国贸易,其一路情形当已熟悉,究竟该商等自入俄境后,俄国官员与其地民人相待若何,沿途有无留难之处,经过各关口,共有几处收税,如何收税之法,如何抽查货物,呈验执照,能无耽延时日,行抵该国,先在何处存货,是否能立行栈,抑暂行赁屋屯寄,所贩运之货,究系在何处销售。其销售之地,该国是否立有限制,驼运脚价等情,该国能无格外需索,并借端欺侮之处,设有偶犯该国禁令之人,被伊知晓,该国如何办理。该商等自假道以

① 《咨报派员赴部请领四联部票一百张相应知照由》(同治七年九月十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1-0057。

② 参见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3—360 页。

③ 《咨报缴销七年分四联执照领取八年分执照由》(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01。

④ 《咨送发过照票数目及商人姓名清册由》(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02。

来,其所得利益究竟若何。以上各情,均希阁下传集,该商等逐一详细函复。前本奏请先行试办一年,现已有逾半载,所有其中情形,本衙门自当预为询悉,且俄使每言中国商人行至彼国,最为优待,并任便赴各该处贸易,毫无限制。”^①可见清廷对于西商在俄国境内关口的税收、销售等情况十分关心,体现出体恤商情的一面。然而,在恰克图的部员却对西商巧立名目,设立新票,进行勒索,致使程化鹏等商人在当地拖延数月之久,以致延误商机。^②这与清政府鼓励西商出境贸易、振兴华商的意愿相违背,严重影响了商民生计,于是库伦办事大臣张文岳将此事及时呈报总理衙门,并派员实地调查。^③

从同治七年十月初八日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开始,到光绪八年三月初八日绥远城将军丰绅奏请停止发给四联执照,西商在14年间领票出境经商情况各不相同,详见表1。

表1 同治七年至光绪七年西商所领部票一览 单位:张

年份	绥远城将军衙门 从理藩院领票数	商人所领部票数	商人姓名及其所领票数
同治七年	100	26	余鹏云(18),张抡元(1),杜明贵(4),秦汾(3)
同治八年	50	7	韩泰邦(5),余鹏云(1),秦汾(1)
同治九年	20	11	李步堂(7),韩泰邦(1),秦汾(2),程化鹏(1)。
同治十年	20	20	李步堂(3),程化鹏(6),李丰泰(4),张抡元(2),秦汾(3),韩兴德(2)
同治十一年	20	20	李年远(3),李丰泰(3),程化鹏(3),韩泰邦(3),南吉喜(3),刘维域(3),贾相清(2)
同治十二年	30	30	程化鹏(4),韩兴德(3),刘维域(3),张师程(1),赵绍舜(3),贾相清(3),李丰泰(3),张师清(2),张怀瑀(3),王存威(3),冯应珍(2)
同治十三年	30	20	韩兴德(3),韩锦章(2),刘维域(3),王存威(1),张怀瑀(2),贾相清(2),赵绍舜(3),程化鹏(2),冯应珍(2)
光绪元年	30	10	赵绍舜(2),王存威(1),张怀瑀(1),程化鹏(1),周鸿禧(1),贾相清(1),郝唐(1),韩锦章(1),霍继相(1)
光绪二年	20	13	张吉时(2),张怀瑀(1),韩锦章(2),赵绍舜(2),李培仁(1),王明益(1),韩如凌(2),周鸿禧(1),霍继相(1)
光绪三年	15	1	韩锦章(1)。
光绪四年	10	4	张怀瑀(2),王存威(1),王明益(1)
光绪五年	10	4	王存威(2),刘继宗(2)
光绪六年	5	3	王福富(1),彭晏(2)
光绪七年	5	5	孔广嵘(3),王正(2)
光绪八年	0	0	0
合计	365	174	174

资料来源:据总理衙门档案中“西商假道恰克图通商案”卷宗26-(1)-(4)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说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商人所领票数。光绪八年开始停止发给四联执照。

从表1可以看出,从同治七年到光绪七年,绥远城将军每年从理藩院所领部票数与西商每年实际领票数存在巨大差异,除同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 and 光绪七年两者票数完全一致外,其他年份西商实际领票数远远低于绥远城将军从理藩院所领的票数,这与商贸路途遥远、沿途关卡林立、所贩运

① 《归化城商民假道俄境通商有无留难等情详细询复由》(同治八年四月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05。

② 《咨行密查商民过恰时该部员等因另换新票拖延两月有无需索情弊据实声复由》(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08。

③ 《查明西商到恰部员等并无另外索费等因由》(同治八年七月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11。

茶叶品种少,西商负担繁重、连年亏损密切相关。光绪元年以后,绥远城将军从理藩院领部票数不断下降,并于光绪八年完全停止。按照清廷规定,准许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以西路商已困极,不能不为别开生路,酌量变通姑准。今将西路之茶,改由北路出恰克图一带销售,仍俟新疆收复,改照旧章”。^①所谓“旧章”,就是指西商往新疆贸易。因西商假道恰克图路途遥远,税厘繁重,为图经济利益,西商纷纷前往新疆贸易,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不断减少。对于西商历年领票出境贸易的动态变化,御史邓庆麟奏称:“试办之初,本期商情踊跃,藉资补救,乃行之数年,每年不过一次,每次运茶不过三四票,或十余票不等。……自假道以来,道远利微,商人观望,并未十分畅行。”^②由此可见,西商对于假道出境贸易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

按照清廷贸易政策规定,西商承领贸易部票之时,须归化城将军招领实力较强、声誉较高的商人做担保。^③而从总理衙门档案看,历年承领部票最多的西商是程化鹏和余鹏云,尤其是程化鹏作为西商领袖,其他商人承领部票多由他担保,可见其实力雄厚。其他商人每年所领部票很少,有些小商人实力不足,往往是几人联合起来共同承领一张部票,进行合伙经营。^④如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商人韩泰邦和李兴隆、彭晏、周自谦即合伙领部票两张。^⑤

假道恰克图赴俄经商的商人数量很多。据笔者统计,领票商人包括余鹏云、程化鹏、李步堂、李丰泰、赵绍舜、韩泰邦、秦汾、张怀瑀、刘维域、韩兴德、贾相清、王存威、韩锦章、冯应珍、杜明贵、南吉喜、张抡元、李年远、孔广嵘、张师清、周鸿禧、霍继相、彭晏、王正、王明益、张吉时、韩如凌、刘继宗、郜唐、张师程、王福富、李培仁、周自谦等33人,且其全部来自忻州地区,这与忻州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密切相关。集中于归化城地区的西商“向往新疆贩运,茶斤系千两、珠兰等茶,由安徽建德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新疆之商,运往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⑥可见西商贩运的茶叶是由忻州转口到归化城地区,再运往新疆贸易。虽然同治年间西商前往新疆贸易路线受阻,开始假道恰克图经商,但茶叶依旧是经忻州转运到归化城,再运往恰克图,进行出境贸易。^⑦由此可见,无论是新疆贸易,还是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忻州作为重要茶叶集散地的地位没有改变,而当地人从事茶叶贸易自然具有地缘优势。

商业字号乃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标识,尤其对坐贾而言,显得更为重要。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的商号一般设在重要的集散地(如归化城和恰克图),以便进行贸易管理。从总理衙门档案来看,主要商号有敬亨泰、南极祥、广益永、顺城泰、汇泉润等,其中尤以程化鹏开设的敬亨泰规模最大。同治八年上半年,假道恰克图贸易的商号不多,“由绥远城将军衙门请领四联执照,贩运茶货来恰者只有三家,一广益永,一敬亨泰,一南极祥”。当时“惟敬亨泰一家,有人在恰系照料,由绥远城发来茶货,并接收来往书信之人。其广益永、南极祥二家之商民,均随同茶货前赴俄国”,^⑧可见敬亨泰经济

① 《议奏华商假道俄边通商请派员赴恰查勘情形由》(同治七年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6。

② 《议奏御史都庆麟奏甘茶引地被占请交督臣一手经理并停理藩院茶票一折抄原奏录旨勘照由》(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30-02-025。

③ 《议复裕瑞具奏归化城商人现因新疆不靖请由恰假道俄边通商由》(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4。

④ 清政府规定,“每张照票不得超过十人,车辆不得过二十辆。该处章京与商酌卓巴特等查核照票,钤盖印记。每票准其贸易一次,即令其回归,呈缴换新票。向在恰克图贸易者,大铺小铺共数十家。小本铺户车辆不能成票者,俱附搭大铺票内……请领理藩院照票运送该处,各自造送货单报验,名为朋票。”孟宪章主编:《中俄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⑤ 《咨送归化城商民等由恰赴西洋诸国贸易茶叶名色数目清册由》(同治八年九月四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15。

⑥ 《议奏华商假道俄边通商请派员赴恰查勘情形由》(同治七年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6。

⑦ 西商从归化城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的路线是:由归化城走喀尔喀部落至库伦,再由库伦至恰克图,即从俄境与西洋诸国通商”。参见《会奏归化城商人呈恳假道通商拟请先行试办由》(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53。

⑧ 《归化城商人敬亨泰等赴俄国贩运茶货由》(同治八年七月十四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13。

实力之雄厚。

由于清政府只允许西商贩运珠兰、千两茶,但仅靠这两项茶色商人难以获利,且出境贸易价格又受到俄商指价,往往亏本出售。对此,绥远城将军定安奏称:“商民等赴外洋数万里之遥交易,若办货太少,往返盘费、脚价需资过重,若办货过多,夷人又复指价勒买,以致此次延至二年有余,始得陆续交易完竣,计多亏本。”^①为扭转不利局面,西商往往夹带杂色茶斤沿途贩卖。如顺成泰^②(义合德在归化城的一个分号)在同治年间之前,一直贩运珠兰茶、千两茶,于新疆地方交易;之后,亦假道出境贸易,但生意萧条,难以获利,便于同治十年在张家口下堡隆顺茶店设茶栈,贩运白毫茶,领票前往恰克图贸易,这违反了既定章程,与北商发生了冲突。^③

为节约成本,有些商人并不领票行商。正如档案记载:“若就领票茶商与俄人交易,近年来实无如许之多,或系不领部票,零运砖茶之小本商人,前赴俄境,积成巨款,亦未可知”,所以领票数并不能反映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的全部情况。还有一些商人虽然领票行商,但往往将茶叶分售小本商人,零星贩运,如同治七年的领票商号大兴玉就在恰克图贸易途中将茶叶分售不同的小商贩。“该小本商人皆系只身备带干粮,负苦前往,但得微利,其愿已足,不存奢望,此系恰地零运之由,亦有小本商人在张家口零运来恰,因不足三百箱,并未在口领票,是以到此无票可验,亦不呈交票规,但由官署发给执照,听其赴马雨尔处换照,贩运出境。”^④这些零售商贩因资本规模小,不具备领票的经济实力,^⑤所以是“无票经营”。清廷要求这些小本商人必须到指定衙门领取执照,交纳税厘后,才能出境贸易。领票西商将商品转手给小商贩,使其长期、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贸易的发展规模,也成为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未能长久兴盛的制约因素之一。

四、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清政府虽然实行恤商政策,使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享有很多优惠,但毕竟路途遥远,存在风险,加之厘税繁重,西商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益,往往铤而走险,逐渐出现了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等逃厘漏税的行为,并在恢复新疆贸易的同时继续假道通商。

(一) 厘税繁重

在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之前,当地进行贸易的主要是北商,但自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之后,俄商可以自行到内地办货赴恰克图贸易,“华商利为所夺,大半歇业”,其中的原因在于“俄商贩茶回国只纳正税一次,而华商贩茶出口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这造成“华商厘税既重,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穷,渐形萧索”。^⑥咸丰年间,北商在恰克图的茶商有百余家,但陆路通商签订之后,骤降到六七家,张家口监督成孚指出其中的原因,“中国商人运茶出口,沿途厘卡层层剥削,及换货进口,又复逐处征收”,并提出“裁撤厘捐,轻减商本”的意见。^⑦

① 《商民程化鹏禀称可否准其夹带各色茶斤出洋贸易始能华夷两便情形请示遵办由》(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28。

② 同治十年,归化城的字号顺成泰私自贩卖白毫茶到恰克图贸易,引发一场争议。赖惠敏不仅对这场争议作了详细分析,而且论述了义合德与顺成泰两字号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参见《申复西商假道贩运安化等茶赴恰贸易一节本口并未发给部票仍行知察哈尔都统查明声复由》(同治十年八月十四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41。

④ 以上参见《禀报赴恰查看茶商各情并借支库伦买卖章京应解银两数目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9。

⑤ 清代政府规定,贩运茶300箱需领部票1张,所以,西商、北商贩运茶叶不足300箱者,不需要领取部票。这些贩茶数量不足300箱的商人就属于小商贩。

⑥ 《密陈税务归恰经理免致俄人争执张家口通商由》(同治七年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17。

⑦ 《详述税务减少并厘卡抽税情形以及假道通商各情由》(同治七年三月三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2。

同治七年四月十一日,李常华在恰克图实地调查中得知,“厘金而外,又有规费制钱五串,每起票一张,又索票费十二三两不……赴恰克图贸易,则到恰时又需纳票规五十两。此外,又有门丁领催等规费二十六两之多”,并指出华商衰落的原因是:“半因俄商侵夺其利,半因厘税过多,成本较重,以致贻累日甚”。^① 税务司马福臣在买卖城考察时,对比了中俄商人茶商的税厘情况:“俄商运茶一箱,除皮重六十斤,其税项各脚费,每箱计需银六两四钱;华商则每箱计需银九两八钱六分。俄商运砖茶一包,除皮重七十二斤,其税项及各脚费,每包计需银四两四钱三分;华商则每包计需银八两四钱五分六厘。”^②由此可见,虽然清政府对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给予了政策优惠,但是相对于俄商来说,中国商人的税厘负担还是很重。

此外,在西商假道恰克图经商头年,恰克图部员就在当地正常税厘外,另设新票,对西商程化鹏等进行盘剥,以致耽延数月,影响商民正常交易。总理衙门对此十分恼怒,在给绥远城将军的下行文书中指出,“恰克图部员,竟敢于奏定章程所发执照外,另立新票,延搁两月之久,始将该商等查验放行,显系格外需索,任意刁难,似此劣员,若不从严参办,何足以儆官邪”。^③ 名目繁多的税厘负担,使得西商不堪重负,在贸易中往往亏损。对此,绥远城将军定安在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赴外洋数万里之遥交易,若办货太少,往返盘费、脚价需资过重,若办货过多,夷人又复指价勒买,以致此次延至二年有余,始得陆续交易完竣,计多亏本”。^④ 面对如此困境,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是“道远利微弱”,最终导致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等逃厘漏税现象的发生。

(二)行贩“杂色茶斤”

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奏称:“西商所贩千两、珠兰等茶,卖给西洋诸国……与北商所贩安化白毫等茶,向卖给蒙古及俄人者不同,西商贩茶至恰克图地方……既与北商各不相扰……拟即准令西商领票,运茶货前往,先行试办……如查该商人有沿途销售,及夹杂别项茶斤,并以多报少,斤数不符等项情弊,由各该处咨交绥远城将军,从严惩办”,^⑤要求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只准贩运珠兰茶、千两茶,不准“夹杂别项茶斤”,这里的“别项茶斤”,是针对北商所贩运的白毫茶、武夷茶而言,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西商与北商的利益冲突,维护边境商业秩序。但西商觉得往返贸易路途遥远,所带茶叶品种较少,难以获利,乃至亏本,以程化鹏为首的西商便纷纷诉苦:“商民等赴外洋数万里之遥交易,若办货太少,往返盘费、脚价需资过重,若办货过多,夷人又复指价勒买,以致此次延至二年有余,始得陆续交易完竣,计多亏本”。^⑥ 同治十年,程化鹏向绥远城将军定安请求“照依新疆贸易,行贩杂色茶斤”。对于出境贸易情形,定安是比较了解的,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若议准夹杂,不得沿途销售”,其言下之意是可以同意西商的申请。总理衙门收到奏报后,提出“究竟所称杂色茶斤,系何项名目,茶叶是否即系北商所贩之安化白毫等茶,与北商生计有无妨碍,未据详细说明……究系何项茶叶,是否即系安化白毫等茶,与北商有无妨碍,一并查明”,^⑦要求绥远城将军、张家口监督、察哈尔都统、恰克图部员等衙门进行调查,查明西商所言“别项茶斤”是否为安化白毫、福建武夷茶。

经调查,张家口监督英瑞指出:“查张家口税务向以南茶,并恰克图皮毛等货,为出入两大宗。近

① 《禀报到口日期并查明收厘各情由》(同治七年四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36。

② 《详述买卖城商情由》(同治七年六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41。

③ 《咨行密查商民过恰时该部员等因另换新票拖延两月有无需索情弊据实声复》(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09。

④ 《商民程化鹏禀称可否准其夹带各色茶斤出洋贸易始能华夷两便情形请示遵办由》(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28。

⑤ 《会奏归化城商人呈恳假道通商拟请先行试办由》(同治七年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1-0053。

⑥ 《商民程化鹏禀称可否准其夹带各色茶斤出洋贸易始能华夷两便情形请示遵办由》(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28。

⑦ 《归化城商民恳请夹带什色茶斤赴西洋贸易系何项名目茶叶应查明声覆由》(同治十年四月七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26-02-030。

数年来,因俄商自贩茶货免征,而本口商贩多有歇业,以致税课支绌。兹西商拟夹杂色茶斤,若是前赴西洋诸国贸易,似属无碍,于北商即不碍于税课。倘由河南、山西绕道归化城,赴恰克图交易,所换之货仍由归化城进口,既避厘金,又省税课。其一切费用,比北商较轻,运至恰克图,亦必贱价售之,而恰克图商人断不肯舍西商之贱,而就北商之贵。由此本口茶贩,前以俄商自办茶货,今再加之西商贱售茶箱,势必俱经停贩,不特与北商有碍,实于张家口税务,大有关系。”由此可见,西商私自行贩白毫、武夷等茶,在归化城领票出口,与北商在张家口贩茶到恰克图相比,路线距离更近,自然节省不少成本。不仅如此,北商的白毫茶、武夷茶一向从张家口纳税,而西商夹带这些茶叶从归化城出口,就能躲避张家口的厘金,最终“既避厘金,又省税课”。到达恰克图后,价格又必然会更低,造成恰克图俄商“不肯舍西商之贱,而就北商之贵”的现象,致使北商茶叶滞销,进而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①

察哈尔都统文盛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说:“查西商向贩千两、珠兰二色茶斤,与新疆缠头回人贸易已有年所,与北商毫无窒碍。今程化鹏突然改办杂色茶斤,是白毫安化等茶,均在杂色茶叶之内,若准其西商改办杂色茶斤,难免日久弊生,夹带白毫安化等茶,指西趋东,潜赴恰克图与俄人贸易。”可见,西商所言“杂色茶斤”确实包括了白毫、武夷等茶。针对西商“照依新疆贸易,行贩杂色茶斤”的要求,文盛担心西商是以贩运白毫、武夷行走新疆贸易为借口,将这些茶叶“指西趋东,潜赴恰克图,与俄人贸易”,从而造成“上系国课,下碍北商”的不良影响。^②从实际情况来看,文盛的担心成为了事实。同治十年七月初九日,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现在西商顺成泰等已入恰行,由张家口请领部票,贩运茶斤,与北商一体贸易”。可见,西商顺成泰也贩运白毫等茶到恰克图贸易。不仅如此,程化鹏开设的敬亨泰等商号,也贩运武夷、白毫到恰克图贸易。敬亨泰等铺户禀称,“其珠兰、建旗、百两封子茶,销售与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至于武夷、白毫大小砖茶,销售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俄罗斯国”,^③从落款来看,夹带白毫茶转售俄罗斯的商号有汇泉润、敬亨泰、顺成泰、广益永、南极祥等。

同治十年六月初七日,北商对西商这种“违规”行为十分恼火,恰克图八甲商民联合禀称:

具禀明情人,恰克图八甲首众商民等,为蒙俯询西商欲办杂色茶斤,与恰邑商民有无妨碍。缘恰邑自立茶行以来向办福建武夷茶,及两湖等处白毫大小砖茶,由张家口到恰,与俄国贸易,由来已久。由同治七年,西商因西路不通,假道于恰,贩运珠兰、建旗、千两等茶,赴缠头地方贸易,与恰商无碍。今西商陈请易办杂色茶斤,由恰假道赴俄国及缠头地方销售。惟思杂色二字,诸茶皆统,显藏含糊之意。倘装湖茶、建茶,则与恰行所办之茶无异,而票规、厘金,与恰行多寡不同,且西商由归化城贩茶出关,与恰商由张家口出关,省费极多,发往俄地,必有贱售紊乱等情,实于恰商有碍滞销,商等皆属黎庶,伏乞一体俯视。若西商希欲易办杂色茶斤,请照张家口茶行陈规,请领部票出口,到恰入行,与恰商一律,庶可上俾国课,下使商民等亦无轻重之分,皆相安于生理矣。^④

由上可见,西商贩运白毫等茶到恰克图贸易,严重影响了北商的商业利益,造成其茶叶滞销,故北商要求西商将白毫等杂色茶斤在张家口领票,按照张家口税则出关,转运恰克图贸易。

对于西商行贩杂色茶斤,张家口监督英瑞亦称:“张家口税务,向以南茶并恰克图皮毛等货为大

① 《呈报商人程化鹏请夹带杂色茶斤赴西洋贸易实与北商有碍由》(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31。

② 《查明程化鹏若准请改办杂色茶斤难免日久生弊由》(同治十年五月八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33。

③ 《咨据恰克图报称西北两商所贩茶斤名色等因抄录该商原禀呈阅由》(同治十年七月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34。

④ 《咨据恰克图报称西北两商所贩茶斤名色等因抄录该商原禀呈阅由》(同治十年七月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34。

宗,皆赖本口商贾往来兴贩,其应输税课,必须该货至口,方始交纳。今西商假道贩运安化白毫等茶,前赴恰克图贸易,必由河南、山西、归化城前往恰克图,所换之货,仍须原由该处回归,南茶北货,既不由张家口行走,本口即无从征收税课。此西商假道贩运安化白毫等茶,前往恰克图贸易,关系张家口两税之实在情形也。”^①

经各地官员调查后,总理衙门责令西商“仍照向章,贩运千两、珠兰二色茶斤,领用绥远城将军执照,假道自赴西洋贸易,不准改办杂色茶叶”,同时也对北商提出要求,“只准贩运白毫砖茶,领用部票,赴恰交易,不准添办千两、珠兰”。^②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西商与北商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维护边境经济秩序,进而达到“上裕国课,下便商民”的目的。

(三) 夹带私茶,侵占甘茶引地

光绪八年,绥远城将军丰绅正式向光绪帝转达了西商的诉求:“近年陆续回程声称,所办茶斤自与洋商交易以来,洋税过重,道路穹远,资本亏折甚多,恳请俯念商民赔累已极,停领四联照票,仍归旧章领用部票,以便携带珠兰、千两各茶,前往乌鲁木齐一带贸易。”^③但是从总理衙门档案来看,在丰绅正式申请恢复贸易之前,西商早已私自恢复新疆贸易,并夹带私茶,途径陕甘地区之时,进行走私贸易,造成甘茶滞销等一系列问题。地方官员纷纷奏请朝廷,要求严查此事。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御史邓庆麟奏称:“甘茶引地被归化城私茶侵占,请停理藩院茶票”,^④针对西商贩运私茶严重损害甘茶的情况,要求理藩院停止发给西商茶票,以恢复甘茶正常贸易秩序。对于西商侵占甘茶引地,理藩院指出:“归化城私茶一日不禁,而官茶一日不行,官茶不行,则国家利权为奸商所据,尽资中饱良可惜也”,^⑤要求严查此事。

清代茶法在道光年间开始实行两种制度,一种是茶引制度,一种是票茶制度。前者是商人在户部领茶引,到指定的地方购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贸易,所谓“引有定额”和“销有定区”,行贩的是引茶;而后者则是商人(主要是晋商)到理藩院领部票,其行销区域限于塞外蒙古地区、恰克图或新疆地区,贩运的是票茶。两者之间不能相互越界,否则会受到严惩治罪。甘肃实行茶引制度,行的是引茶,西商的票茶不应进入甘茶引地进行贸易。而关于甘茶引地,光绪三年邓庆麟奏称:“西北各省,惟甘肃专设茶马道,亦惟甘督官衔,兼管茶马事务,可见茶政乃专责,除甘省别无茶引,是西北口外,概系甘茶引地也”,^⑥可见甘茶在西北的行销区域十分广泛。然而,早在道光年间,就有一些奸商私贩“无引私茶”进入甘肃贸易,造成甘肃商业秩序混乱。道光八年,针对“奸商请领理藩院部票,贩茶至新疆等处,甘司引地被占”的情况,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请严禁奸商私贩茶叶,并在新疆地区设局稽查,“甘肃官引额销茶叶,每年例应出关二十余万封,近来营销竟至四五十万封之多,显系以无引私茶从中影射,其营销各城,又复递加价值,每副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余两不等。此等奸商私贩,勾通外夷,剥削回众,不可不严惩禁绝。”^⑦

① 《咨复西商领票改贩白毫等茶一事咨查张家口监督查明声复由》(同治十年八月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40。

② 《申复西商假道贩运安化等茶赴恰贸易一节本口并未发给部票仍行知察哈尔都统查明声复由》(同治十年八月十四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26-02-041。

③ 《具奏到赴洋商民委因长途税重连年折本请停四联执照仍领部票前往新疆贸易等旨读衙门议奏由》(光绪八年三月十八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3-002-048。

④ 《片行御史邓庆麟奏请停茶票一节应由贵部及理藩院商办由》(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05-04-001。

⑤ 《知照御史邓庆麟奏甘茶引地被归化城私茶侵占请停止理藩院茶票等因一折奉旨该衙门议奏应由贵衙门主稿希示复由》(光绪三年六月十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05-04-002。

⑥ 《知照御史邓庆麟奏甘茶引地被归化城私茶侵占请停止理藩院茶票等因一折奉旨该衙门议奏应由贵衙门主稿希示复由》(光绪三年六月十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05-04-002。

⑦ 《清续文献通考》卷 42《征榷考十四·榷茶》,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7963 页。

同治年间,因贸易路线受阻,甘茶引无人认领,乃至“积欠茶课至四十万两之多”。^①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②着手整顿西北茶务。光绪元年,左宗棠以“晋商逃散,甘肃茶引无人课程”为由,将“新疆并入湖南引地之内,以资直补”,招徕湖南商贩运茶贸易,其贩运之茶称为“官湖茶”,造成西商所运之茶成为私茶。^③

光绪年间,西商夹带私茶、暗地运销甘肃地区的现象更为突出。因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在税厘方面享有优惠政策,而甘茶引地则按照原定税则,故西商夹带私茶进入甘茶引地贸易会获得厚利,严重影响了甘茶市场,造成甘茶滞销。理藩院称:“由归化城无引私茶,税轻价贱,全占官茶引地,以致商累日深,而课额亦无着也”。对此,御史邓庆麟于光绪三年六月初十日奏称:“由恰克图假道俄边,往西洋售茶。理藩院准给四联执照,每票市茶一万二千斤,完厘银三十两,税银二十一两七钱八分。是砖茶原税较甘茶,每引八十斤完课银四两四钱四分者,每票一万二千斤,已减银六百一十四两零矣,无怪私茶之充斥也……自同治十三年起,共办茶三万余引,运存道库者二万余引。不料彼此相形,官茶滞销已极,各商守候,已及三年,旅费日增,月息日重。现在由此倾家者,不可胜数,再阅二三年,本息相并,数十万金之资本化为乌有矣,困苦情形,实堪矜悯。推原其故,由归化城无引私茶,税轻价贱,全占官茶引地,以致商累日深,而课额亦无着也。”邓庆麟认为西商夹带私茶,严重影响甘茶贸易,是造成甘商困境的主要原因,于是感叹道:“归化城私茶一日不禁,而官茶一日不行。官茶不行,则国家利权为奸商所据,尽资中饱良可惜也”,并提出“派员设局经理,并停理藩院茶票”的建议。^④

经过调查,户部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说:“西商领票运茶,前赴边外贸易,系在缠头、回子地方,与甘茶引地,实无干涉,且千两、珠兰茶,由安徽贩运;甘茶由两湖采办,来路不同,甘茶与票茶,彼此各行各路,非侵占厘课数目,自毋须两相比较,致多轳轳。况自假道以来,道远利微,商人观望,并未十分畅行。如果将来或有起色,西北一律收复,商路大通,彼时自应另筹办法,请旨遵行,刻下开办未久,未便遽议,更张徒滋烦扰。所有西商假道运茶之处,拟请查照前奏,仍旧办理。”可见,户部并没有同意邓庆麟停止理藩院发给茶票的建议。同时,户部不能断定“奸商藉院票为护符,专贩私茶,侵占甘茶引地”是否真实,^⑤于是要求绥远城将军详细查明,再行核议。

光绪十三年,西商“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贩货运销蒙古地方,其实私贩湖茶,侵蚀新疆南北两路,到处洒卖,一票数年,循环转运,漫无限制,逃厘漏税,取巧营私,以后领票,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厘,与甘商一律办理,恢复运销私茶,查出将货充公”。^⑥由此可见,西商夹带私茶、贩运甘茶引起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四)恢复新疆贸易的同时,继续假道恰克图贸易

因假道恰克图贸易税厘繁重,程化鹏等商人多次呈请停领四联执照,按照旧章,仍前往新疆贸易。光绪八年三月十八日,绥远城将军丰绅奏称:“查该商民等,自同治七年起请领四联照票,遵照奏定章程,携带茶货由恰克图假道俄境通商以来,至今十有余年,中外交易均属相安,并无别故,第因洋税过重,道阻且长,资本亏折,赔累已极,呈恳停领四联执照,仍归旧章领用部票,携带珠兰、千两各项茶斤,前往乌鲁木齐一带贸易,系属实情。现在新疆各城均已次第肃清,该商民所请核,与奏定章程

① 《新疆图志》卷33《食货志二·茶法》,第320页。

② 《清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考十四·榷茶》,第7965页。

③ 具体内容参见刘卓《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第127页。

④ 以上参见《知照御史邓庆麟奏甘茶引地被归化城私茶侵占请停止理藩院茶票等因一折奉旨该衙门议奏应否由贵衙门主稿希示复由》(光绪三年六月十九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05-04-002。

⑤ 《议奏御史都庆麟奏甘茶引地被占请交督臣一手经理并停理藩院茶票一折抄原奏录旨勘照由》(光绪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20-030-02-025。

⑥ 《清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考十四·榷茶》,第7965页。

相符,惟事关奏准之案,应即据情具奏。”^①这项建议获得光绪皇帝批准。于是从光绪八年开始,理藩院停止发给西商部票,恢复新疆贸易。

然而,从总理衙门档案来看,西商在恢复新疆贸易的同时,可继续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正如户部给总理衙门的行文中称:“此次改归旧章,系专指该商民由从前旧路运茶,赴新疆各城者而论。此外,如有携带茶货,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者,仍应请领四联执照,按新章纳厘,以重税课,而杜弊端。”绥远城将军丰绅奏称:“嗣后由从前旧路运茶赴新疆各城,照旧章领用部票。其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者,仍应请领四联执照,如此分别办理,既可并行不悖,亦无虑其混淆,一切章程,均应如户部所议办理。”

与此同时,西商在前往新疆贸易的途中仍然夹带私茶,侵占甘茶引地。按照规定,商人每年年底必须将部票呈缴理藩院,以免出现逃厘漏税,但程化鹏于光绪八年请领部票到新疆贸易后,一直未能将部票呈缴。光绪十一年,绥远城将军将此事报告给总理衙门,要求程化鹏将此前承领的部票如数呈缴:“晋商程化鹏等请领部票,原令一年呈缴,以免逗留,乃迄今三载,该商未闻有一呈缴者,则每票一张,其回环冒运次数,已不可究诘,应咨查照,转饬归绥道,即将前领逾限印票,勒令如数缴销。”陕甘总督指控以程化鹏为首的西商“夹带私茶,到处洒卖,一票数年循环,转运逃厘漏税,取巧营私”。针对此问题,户部要求理藩院着手进行处理,并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不准该商等潜用院票,配带湖茶洒卖私销,侵占甘司引地,以免偷漏而裕课厘,仍咨行陕甘总督、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转饬所属,一体查照。如晋商复萌故智,任意私销,即按照上年奏案,将所贩私茶罚令入官,仍治该晋商私贩之罪可也。”^②

综上所述,同治到光绪前期,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西商往往违反政府订立的章程,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侵犯甘茶引地,而且在恢复新疆贸易的同时,继续假道通商,造成西北边境商业秩序的混乱。地方政府、户部、总理衙门等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商贸易的违规,但也一直未能根治。

五、结语

清代档案称从归化携带茶叶前往新疆、安集延国等贸易的商人为“西商”。同治年间,西商前往新疆贸易路线受阻,陷入商民两困境地。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两湖、福建等地区陷入困境,北商失去重要的茶叶货源地,造成茶叶贸易日益衰落。同治七年,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贸易,以程化鹏、余鹏云为首的西商向清廷提出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清廷对此事十分重视,并派要员到恰克图考察商贸情况,最终出于恢复边境贸易秩序、缓解财政压力和“分俄商之利”的综合考虑,准许西商假道恰克图出境贸易。

晚清时期西商假道恰克图赴俄境贸易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出现的,显示出清廷在应对新的历史环境下,善于对传统的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对西商、北商贩运商品做出区分,是合乎实际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西北部边境社会经济秩序,也使得商民生计得以维系,有利于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在税厘、票规银等方面对西商给予一些惠商政策,促使西商积极踊跃进行贸易,先后有数十人参与其中,促使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初期出现一度的繁荣景象。在商业贸易中,以敬亨泰、广益永、南极祥、顺成泰等为主要商号,尤以程化鹏开设的敬亨泰的经济实力最强。

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中,为缓解财政压力,晚清政府亦在西商贸易过程中征收厘金和各种税捐,使得西商遭受繁重的税厘压力。加之,俄商在茶叶贸易过程中的竞争,致使西商贸易陷入夹缝中求生

^① 《具奏到赴洋商民委因长途税重连年折本请停四联执照仍领部票前往新疆贸易等旨读衙门议奏由》(光绪八年三月十八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3-002-048。

^② 《咨报不准晋商潜用理藩票配带湖茶洒卖私销侵占甘茶引地之处已咨行各处由》(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档案,档号 01-20-005-04-003。

存的境地。为扭转商业贸易不利局面,西商逐渐行贩杂色茶斤(贩运武夷茶、白毫茶),从而引发西商与北商之间严重的经济冲突。不仅如此,西商在贸易中还逃厘漏税、侵占甘茶引地,进行走私贸易。这些都造成西北部边境经济秩序的混乱,最终影响了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西商贸易亏损,除了与清政府沉重的税厘负担相关外,还与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接连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贸易主权有莫大关联。^①这些都说明国家主权不能自主的晚清时期,中国商人贸易毫无制度保障,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Research for Western Merchants Trading via Kyakhta in Late Qing Dynasty

Kang Jian

Abstract: During the unrest of Hui Nationality during Emperor Tongzhi period in Qing Dynasty, western merchants trading to Western Xinjiang area has been interrupted and the livelihood of many merchants cannot be maintained. In consideration of maintaining commercial order in border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venue, the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allow foreign trading by western merchants via Kyakhta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tax rate & tax refunding have been granted. Meanwhile, to avoid any benefit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and northern merchants, the government has set strict regulations on trading route and tea grading for western merchants. To meet the financial pressure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 different kinds of heavy taxes have been levied by Qing Dynasty. This has brought much burden to western merchants and their enthusiasm for foreign trading has declined gradually. At the same time, driven by economic benefits, many problems have occurred during western merchants trading process including selling low graded tea, tax evasion, tea smuggling and mixing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place of origi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 Merchants, Via, Kyakhta, Trade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与中国经济关系,参见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第243—360页。